

摇自由史论／□(英)□阿克顿(粤译)著;费尔斯(云译);分册为编;胡传胜等译援南京:译林出版社,圆园员年。

摇(人文与社会译丛)

摇书名原文:□耘葬葬葬蚤葬蚤□月葬葬葬葬葬葬

摇陈日昌译苑图影范图图 载

摇 I 援自...摇 II 援阿... ②费... ③胡...摇 III 援自由-研究-英国-近代摇 IV 援成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 01(2015) 0 第 000000 号

书摇摇名摇摇自由史论
作摇摇者摇摇[英国]约翰·阿克顿
译摇摇者摇摇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
张华 朱珊 蒋海怒
责任编辑摇摇刘金源
原文出版摇摇[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摇摇译林出版社
社址摇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257号
电摇摇话摇摇010-65259066
电摇摇邮摇摇100010
地摇摇址摇摇北京湖南路9号(邮编 100010)
照摇摇排摇摇译林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摇摇刷摇摇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摇850mm×1168mm
印摇摇张摇摇14
插摇摇页摇摇无
字摇摇数摇摇约10万字
版摇摇次摇摇第1版
版摇摇期摇摇1999年11月
印摇摇数摇摇1000册
书摇摇号摇摇CIP 99-051808
定摇摇价摇摇18.00元

目 录

前 言(费 尔 斯)	(员)
第一部分 自由史	(员)
一、古代自由史	(猿)
二、基督教自由史	(圆)
三、欧洲民主政治史	(缘)
第二部分 英美自由传统	(愿)
四、清教革命	(愿)
五、辉格党的兴起	(怨)
六、英国革命	(员)
七、汉诺威嗣位	(员)
八、论英吉利共和国	(员)
九、论伯克	(员)
十、对 员 世纪观念的反叛	(员)
十一、违反自由精神的自由主义	(员)
十二、麦考莱与辉格党理论的两个传统	(员)
十三、利物浦伯爵的平庸	(员)
十四、女王日志	(员)
十五、妥协是政治的灵魂	(员)
十六、殖民地	(员)
十七、美国革命	(员)

十八、美国的影响	(国缘)
十九、论汉密尔顿	(国国)
二十、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因	(国缘)
二十一、美国内战的历史地位	(国缘)
二十二、美国内战记	(国国)
二十三、阿克顿—李将军通信	(猿源)
二十四、奴隶制与自由	(猿员)
二十五、分离运动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阶段	(猿缘)
二十六、内战史评论	(猿苑)
二十七、美国的媒体、大学与国会	(猿国)
二十八、美国英语	(源国)
二十九、公正对待保守主义	(源愿)
第三部分摇摇自由与现代民族国家	(源员)
三十、民族性	(源猿)
三十一、加富尔	(源国)
三十二、意大利的宪政精神	(源国)
三十三、普鲁士改革与日耳曼政治传统	(源愿)
三十四、从保守的自由主义观点看	(源愿)
三十五、官僚主义与两种政治思维	(缘猿)
索摇摇引	(缘缘)
后摇摇记	(远缘)

前摇摇言

肇

约翰·埃默里齐·爱德华·道伯格—阿克顿 1834年 9月 24日生于那不勒斯。^① 在他的父亲费迪南·理查德先生 1867年去世后他即承继为准男爵第八和在什罗普郡的奥登海姆的家庭遗产。1872年由于对自由党首相威廉·爱华特·格拉斯顿的忠告他被擢升为贵族,成为奥登海姆的阿克顿男爵。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854—1856)之后,阿克顿回到英国,担任自由天主教的发言人。^② 作为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和政治上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促进个人自由、政治上的自治和不

① 阿克顿传记中 格特鲁德·希姆法伯的《阿克顿勋爵:良心与政治的研究》(芝加哥,1964)仍属上乘之作。希姆法伯广泛运用了已于 1904年捐献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阿克顿的文章和笔记。大卫·马修的《阿克顿勋爵及其时代》(伦敦,1964)对阿克顿生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的介绍重于对他本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赫伯特·舒廷格尔的《阿克顿勋爵:自由的历史》(伊利诺斯,1970)是对阿克顿具有同情的记述。约翰·肯扬的《史家: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科》(伦敦,1964)第 194—195页,是最近的讨论,也是对阿克顿带有批评性的讨论,但其中也暴露出肯扬对阿克顿的著作缺少第一手资料。

自从希姆法伯著作出版以来,因为阿克顿与都林格、辛普森的通信集的出版,我们关于阿克顿的知识增进了许多。此外,希姆法伯所使用过的阿克顿在剑桥的文稿包含他的第一手研究笔记。196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大箱阿克顿的通信和文稿。因此,现在似乎等待一部利用所有这些新资料的阿克顿传记的出版。

② 阿克顿在自由天主教运动中的作用是《阿克顿选集》第 3卷的内容。这方面详尽的学术研究包括约瑟夫·阿索尔兹的《英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随笔 及其 1834—1840年的作者群》(伦敦,1964)以及休·麦克杜戈尔:《阿克顿—纽曼关系: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困境》(纽约,1964)。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一般情况,见爱德华·诺曼的《19世纪英国天主教教会》(牛津,1964)。

受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阿克顿认为,通过这些原则的成功实施,正义的事业、天主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利益将会得到保证。为献身于这些理想,阿克顿成为两个时间不长但却很出色的期刊《随笔》和《内外评论》的合编者与投资者。他为之写了很多随笔、书评和有关时事的文章。在《内外评论》于1844年停刊之后,阿克顿为《编年史》(1844—1845)和《北不列颠评论》(1845—1846)写随笔和评论。他对这源个期刊的贡献不仅包括对当代天主教^③问题的随笔,而且还有对当前的观念和事件,如欧洲大陆上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美国内战的历史研究与政治上的分析探讨。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自由及其赖以得到保障的手段。除这些新闻活动以外,他还在下院有一个短暂的从1846年至1848年的自由党议员时期。^④

对阿克顿说来教皇不会犯错误的观念是对历史真实和政治自由主义所有准则的一种践踏。他相信,天主教成为一种进步和自由力量的所有希望,被宣称教皇是宗教和人类道德良心不会犯错误的仲裁者这样一种教义所损害。他在1846—1848年领导反对梵蒂冈教廷关于教皇不会犯错误教义传播活动中发挥

^③ 这些期刊的历史的较详细的讨论,见阿索尔兹和麦克杜戈尔的著作,也见下面两项成果:欧根·克拉克:《天主教自由主义与教皇绝对主义》(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44)以及盖尔·鲁恩的《1844—1846年阿克顿圈子:编年史和北不列颠评论》(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42)。

^④ 阿克顿的议员生涯是詹姆斯·奥克乌莫迪的系列论文的主题:《作为下院议员的阿克顿》,《亚力山大里大学人文学报》,第1卷(1944);《阿克顿当选爱尔兰议员》,《英国历史评论》,第11卷(1944),第149—154页;《阿克顿:年轻的议会活动家》,《澳洲与新西兰历史研究》,第1卷(1944),第1—10页。

了最直接和最积极的作用。^⑤ 随着他的自由天主教运动的失败和影响的丧失,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告结束。他仍然留在教会;但他在天主教的知识界不再起什么作用,也不常写东西发表。他代之以从事个人的历史研究,在英国,在里维埃拉,以及在巴伐利亚的泰格斯别墅过着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他与格拉斯顿保持一种密切的知识分子的和政治上的关系,他对这位首相的影响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可以见到,如格拉斯顿对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以及爱尔兰国内制度的支持。^⑥ 作为女王侍臣,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他的学识,他道德上的正直以及社交时的典雅风度使他成为维多利亚英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864年以后他的文字活动已很少。他1867年关于“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的演讲可视为范围更为广泛的《自由史》思想的起源。该书并未超出此阶段的研究和计划;但阿克顿在此过程中收集的大量材料和其他的研究仍可表明其历史学识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阿克顿是185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建者之一。在1857年至1863年他给此杂志提供了两篇长文和12篇评论文章。在这样厚实的历史学贡献基础上以及

^⑤ 阿克顿和梵蒂冈委员会的关系在《阿克顿选集》第1卷中讨论。这方面的一手材料和解释性论文收集在戴米安·麦克克拉特的《阿克顿勋爵的决定性年代:1856—1863年》(卢汶,1984)。阿克顿这个时期的日记已由爱德蒙·坎佩翁编辑出版,题为《阿克顿与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日志》(悉尼,1984)。除了这本资料集和麦克杜戈尔、鲁恩的著作以外,还有维克多·康齐米乌斯的《阿克顿勋爵和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教会史杂志》,第10卷(1982),第105—108页。

^⑥ 阿克顿与格拉斯顿的关系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见威廉·宰德特:《阿克顿与格拉斯顿:他们的友谊与相互影响》(美国天主教大学学位论文,1984),以及欧文·查德威克的《阿克顿与格拉斯顿:1863年来顿历史讲座》(伦敦,1984)。

由于他已具有“在世最有学识的英国人”之名望,阿克顿 1828 年被任命为剑桥皇家教授。^⑦ 他的人格,他的演讲,他作为《剑桥近代史》的组织者和主编的角色对英国的历史研究都发挥了直接的和有益的作用。在他去世后的 1890 年 12 月 15 日,他的有 苑万本藏书的图书馆,连同他毕生收集的研究资料都通过剑桥图书馆献给了历史研究。他的学生费格斯和劳伦斯出版了他的剑桥演讲《论法国革命》和《论现代史》两卷论文集,一卷信件。他的头衔被他的儿子理查德·马克西姆·道伯格—阿克顿,即阿克顿男爵第二所继承。

阿克顿的生平事迹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但它们对那些使他成为维多利亚知识界最出色和最难以把握的人物之一的复杂思想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

首先是贵族式的。阿克顿是什罗普郡一个有着很长谱系的准男爵的后裔。他们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好几代人均在大陆上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阿克顿的祖父约翰·阿克顿先生升至那不勒斯波旁王国的首相,阿克顿的父亲费迪南第六即费迪南·理查德先生与达克迪·道伯格的女儿和继承人玛丽·比宁·迪·道伯格结婚。因此她属于最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当阿克顿的父亲去世时,她再嫁而进入强大的英国辉格党贵族政治的社交领域。她的第二位丈夫和阿克顿的继父是上院的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伯爵是格拉斯顿亲密的政治盟友,并三度加入他的内阁。阿克顿的妻子也出生于一个在巴伐利亚和意大利都很有名的家庭。

这样的出生和家庭关系使阿克顿能过着一种有特权的和自

^⑦ 阿克顿的学识引自孟德尔·克来顿(《英国历史评论》的首任主编)、路易·克来顿:《孟德尔·克来顿的生平与通信》,第 1 卷,第 100 页。

由自在的生活。他身处欧洲大陆和英国社会最为珍稀的阶层之中。在晚年他也确实感到手头较紧,但从未迫使他把手头活动变成挣钱的工具。这使他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最初的文学家,也有别于现代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其对阿克顿说来是事业。他从未得到一个学院的学位。他被授予慕尼黑、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他并未按学院的方式工作。他的第一个和惟一的岗位是联合王国两个最著名的历史教授职位之一。

然而,阿克顿并不是一个贵族式的半瓶醋。他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其职业素养远过于英国其他可与之相比的同代人。^⑧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阿克顿年轻时未被允许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他代之于去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受教于天主教会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伊格纳兹·冯·都林格。在阿克顿的生涯中,没有什么比伊格纳兹·冯·都林格的影响更为重要。都林格对这位 19 岁的英国准男爵承担了父亲的角色。阿克顿住在都林格的家里,陪他旅行去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学者那里。19 世纪的德国正是历史研究的前沿,都林格则身处一流德国历史学家之列。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学会了把历史看做科学,而不是艺术。历史学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以及对之进行的客观评价追求真理。在对档案材料重要性的评价和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尽可能根据原始文献本身的理解方面,他从根本上超越了都林格。说担任剑桥皇家教授的阿克顿置身于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列是相当公正的。他是一位在方法上领先于 19 世纪的大师,而他对心智史重要性的重视预示了 20 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发展的潜在趋势。

^⑧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阿克顿是《阿克顿选集》第 4 卷的主题。

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也学会了历史地思考——视历史为理解现实的工具。以都林格为榜样,阿克顿在历史中找到了在两个指导他毕生的原则——自由主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实现和解的工具。

阿克顿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该词的经典意义上,他相信“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⑨他认为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但仅仅在推进保证和促进个人自由的限度内。

对于英国圣公会仰慕者的困惑,阿克顿认为他对自由的忠诚和他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信仰之间并无矛盾。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都是不容置疑的。他相信基督教的启示是自由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个人的价值无可估量,其恩赐的自由超过希腊或罗马所拥有的一切。他以其直觉视教会为促进自由的重要的潜在力量。只有教会拥有一个能抵抗现代政府及其绝对化趋势的组织。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抑制和平衡,教会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广泛的保证。阿克顿认为,教皇不会犯错误论像所有的绝对主义一样不仅是不明智的,是个错误,而且是不道德的。阿克顿心目中的道德尺度与他关于自由、历史和宗教的所有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阿克顿提及道德时总是涉及自由和宗教。自由给人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的机会。真正的宗教能使人的良心和知识升华,以至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

^⑨ 参见以下[边码]第 144 页。

习惯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能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的竞争。”^⑩

阿克顿不相信道德能与政治或公众生活相分离。为爱国主义的理由下命令谋杀的政治家与为金钱拦路抢劫杀人者同样都是谋杀犯。阿克顿认为,用同样的词对之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阿克顿主张历史有一个道德目的;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⑪

阿克顿自己的一生道德色彩也同样强烈。他是那些仅通过研究其私人文献就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的研究笔记和一生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件给了我们一副阿克顿的肖像,其才智和性格非他的公开出版物所能包含。通过那些熟悉他的个人亲眼所见能看清楚其非凡才智和品格。剑桥学监和天主教主教都感受和谈到一个拥有“所有美德而无缺点”^⑫者的个人魅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格拉斯顿信任他“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约翰·莫利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

^⑩ 见以下[边码]第猿—源页。

^⑪ 至于伯克和这段语录请参见阿克顿在剑桥的就职演说,《历史研究》(伦敦,员愿缘年)第 远猿苑—猿页。该演讲见《阿克顿选集》,第 圆卷。

^⑫ 该引言来自奥撒·希朗的《晚年的回忆》(伦敦,员愿缘年)第 员页。

人物之一”^⑬。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权力走廊漫步的人仰慕这位学富五车、胸襟开阔的人，他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给人咨询，并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出一本书的微言大义。

然而那些最仰慕他的人也能感到有一种失败感在主宰着阿克顿。在一个笔记中他对自己说他的一生荒废了。^⑭ 这样一种失败了的使命感和荒废感我们可以从本卷前页的肖像中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中看出。

年轻时他就寻求把他的学识贡献给天主教事业。他的目标是教育普世基督徒懂得“教会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科学方面都不追求她自己的目的。如果她鼓励追求科学的目的即真理，追求国家的目的即自由，那么她将会达到。”^⑮ 梵蒂冈教廷终止了这一使命。当他认识到即使是他的良师和密友都林格对他关于历史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够理解，更不用说同情时，他只得放弃对《自由史》的构思。当阿克顿在他关于乔治·艾略特的文章以及关于曼代尔·格雷顿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世系史》所写的评论中提出关于道德以及一位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之思想时，他的仰慕者也对之感到困惑。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思想，这样一种感觉起了很大作用，促使阿克顿不愿开始动笔撰写他的《自由史》。因为他对他的最热心崇拜者之一、首相的女儿玛莉·格拉斯顿表白过：“我既没有信徒也没有同情者，因为他们从不给我鼓励和信任。”

^⑬ 格拉斯顿的观点包含在阿克顿写给他的女儿玛莉·伊丽莎白·安妮的一封信中，此外见手稿，原稿第 101 页。莫利的论文见他的《回忆录》（纽约，1894），第 1 卷，第 101—102 页。赫伯特·鲍的《阿克顿勋爵致玛莉·格拉斯顿信件》中“引言”（纽约，1894）第 101—102 页提供了阿克顿对那些熟悉其个人者影响的生动说明。

^⑭ 另见手稿，原稿第 101 页。

^⑮ 《阿克顿—辛普森》，第 1 部分，第 101 页。

对于他没有发表更多的东西之遗憾,我们可以说,阿克顿的学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是在他已出版的随笔、演讲和评论中,在他的通信和未出版的笔记中,他留下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创造性的知识遗产。19世纪70年代至20年代的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格特鲁德·希姆法伯,英国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以及德国的乌里奇·诺安克在利用这笔遗产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阿克顿,他的话对于亲见了欧洲物质的和道德的腐败以及具有法西斯主义政体伪装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一代人具有先知般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阿克顿仍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令人信服地直接与我们说话。他对人性和政治的本性,对人类自由的意义,对那些促进和威胁人类自由的力量之深刻洞见,比一个多世纪前他撰写它们时声音更为响亮和传得久远。他的启示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位善于思考的公民都至关重要。让阿克顿再次以自己的语言对我们这代人说话,这正是编本选集的目的。

詹姆斯·费尔斯

1954年 远月

第一部分

自搖由搖史

一、古代自由史^{* 1}

缘

自由,从公元前四百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直到在我们民族成熟收获。它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精美成果;自从那些懂得此术语含义的民族决心获得自由以来,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每一时代的进步都被自然灾害,被无知和迷信,被征服欲和安逸,被强者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欲求所困扰。当人民从野蛮状态、外来控制和长期的生存斗争之中苏醒时它已经阙如已久,当时对政治失去了任何兴趣和理解力的人渴望为了一口燕麦粥出卖自己的生存权,而无视他们所弃之物之珍贵。在任何时代自由的忠诚之友都非常稀少,它的胜利归功于少数人,他们成功地联合了那些意见经常不同于自己的人作为援助,这种联盟总是危险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它给反对者以反对的口实,在胜利时也会引发对胜利成果的争端。对自由性质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以致从来没有什么障碍是如此持久和难以克服。即使敌对势力造成了那么多伤害,错误观念所造成的还更多,但知识的扩展和 远

* 本文与《基督教自由史》首次作为阿克顿勋爵于 1868 年 1 月 1 日和 1 月 15 日在农艺大厅对布里奇诺思学院成员所作的两个演讲《古代自由史与基督教自由史》发表(布里奇诺思 悦爱迪金印刷厂),两项讲演分别为 5 页、5 页。第 1 次发表于《自由史》,第 1—4 页;《自由与权力》,第 1—5 页;《历史自由的解释》,第 1—5 页。

法律的改善仍显示了它的进步。制度史常常也是一部蒙昧和幻觉的历史,因为其作用有赖于其所产生的观念以及将之保存下来的精神,在内容实质出现变化时形式仍可保持不变。

现代政治中有少数几个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何我论证的重点在法律领域之外。常有人说我们的宪法在1789年通过《人身保护法》时形式上已很完美。然而查理二世继位仅四年,就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之外。1689年,在凡尔赛召集三级会议之时,比自由大宪章更悠久、比我们的下院更有威望的西班牙议会在间隔几代人之后也告召开,但他们立刻请求国王不要与他们商量,以他自己的智慧对权力进行改革。公众舆论认为,间接选举是对保守主义的一种保护。但是法国革命的所有参与者都来自间接选举。有限制的选举被公认为是君主制的另一个屏障。但是由100万名选举者选出的查理十世的议会反抗并推翻了这位君主,而由100万选民选出的路易·菲利普的议会顺从地推进他的大臣的反动政策,在关键的表决中拒绝改革,对这位君主卑躬屈膝,基佐也得到1000位官员的大多数投票支持。没有报酬的议会显然比大多数接受报酬的欧洲议会更加独立。但是美国派一个人自费从此地到君士坦丁堡这个费用最昂贵的首都生活一年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总统在法律上和对外似乎是华盛顿的继承者,其权力是费城制宪会议设计的且受其制约。实际上新总统并非如这位共和国之父所想像拥有不同于民主制的君主般广泛权力,因为那会让100万人的公职发生变化。1789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仅解雇100个人。购买官职很明显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古老的法国君主制的这种可怕实践产生了能与国王相抗衡的惟一法人团体。会毁掉一个国家的官吏腐败在俄国被当做有益于减缓绝对主义压力的因素。在此情况下说奴隶制本身是自由道路的一个阶段简直是一种夸张。因此我们今晚不必像

关心人们的活的思想那样细究法规、法令死的字面含义。众所周知,一个世纪以前大法庭一个法官听讼,当事人必须付三个人的钱,但是没人注意到这种暴行,直到一位年轻的律师对过去的事情及与此相关的制度的方方面面产生疑问并带此怀疑进行严格的检查。那天一线曙光照亮杰里姆·边沁清澈而坚定的心,在政治日历中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胜过很多政治家的整个任期。我们很容易指出圣奥古斯丁某段话或格劳修斯的一个句子对缘人议会法案的重大影响,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塞罗与塞尼卡、文纳与托克维尔的要多于莱库古立法或法兰西第五法典。

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斗争。在古代,国家所掌握的权力不仅来自自身,而且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中世纪它的权力很小,而遭受了其他入侵。现代国家常落入这两个极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按此定义,自由是宗教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因此我所论述的主题是在选民[基督教]的历史中得到第一次闪光。希伯来人的政府是一个联盟,其形成不是靠政治权力而是靠种族和信仰的一致,其建立不是立基于物质的力量而是自愿的契约。自治的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个部落,而且至少在缘个家族的任何一个都得到实行:在法面前既没有特权阶层也没有不平等。君主制与这种共同体的原初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撒母耳以对所有亚洲王国和许多欧洲王国所一直坚持的东西作强烈抗议和警告来抵抗。该愿王位的建立依据一项协议,国王被剥夺了对人民的立法权,他们

承认的立法者只有上帝,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是恢复法的原初纯净,让政府符合上苍认可的神圣的理想范型。那些在反对篡位者和暴君的无尽预言中苏醒并受到鼓舞的人们经常宣称神圣的法无比高于罪恶的统治者,并从已建立的权威,从国王、祭司和王公贵族转向呼吁回复潜藏在群众中未堕落意识之力量。因此希伯来民族的榜样阐明两条平行的路线——民族传统教义和更高律法的教义。法律的成长有其根源与发展过程,但其实质不会改变的原理以及所有政治权力都必须根据一种非人为的法律进行检验和改革的原理,循此能够赢得所有的自由。这些原理的运作,无论与之一致与否,都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空间。

在神权之下的自由与人类专制主义权力之冲突,结果是灾难性的。公元前 704 年耶路撒冷作最大努力以改进和保存该国。耶和華神殿的大祭司拿出那本已被遗弃和遗忘的律法书,国王和人民都曾发誓遵守和受束于它。但是这个有限君主制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早期例子既没有延续也没有扩展:自由取得的力量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求。在公元前 586 年君主专制的洪水淹没了这个曾经存在而且注定会再次存在的城市,它是东方的自由圣殿,西方则将为其准备一个新的家园,那里有大海、高山和坚定的心灵为其护卫,圣洁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都将生活在它的身影下,它伸出自己无敌于天下的臂膀,动作缓慢然而坚定地指向整个文明世界。

按照欧洲大陆那个最著名女作家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却是新的。为该普遍真理辩护是新近历史学家的骄傲。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证明了这一点,条顿人的欧洲则是更为充分的证明。无论我们在哪里追溯雅利安人的早期生活都能发现有利于发展成自由社会的条件和辛勤劳作的文化。他们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兴趣,对外在的权威没